
试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形成原因

张建立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在如何认识侵略战争历史和如何承认战争责任等具有原则性的问题上,出现了右倾化的趋势。日本人的这种历史认识问题的形成,与美国的纵容、皇国史观的影响固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以退为进的罪己心理、既往不咎的袪褻心理和唯强是从的实用主义心理,对其历史认识的影响也不容小视。

关键词: 历史认识问题 心理文化 罪己 袪褻

作者简介: 张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7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874(2012)02-0145-13

近些年来,“历史认识问题”,成为中日两国各个领域的人们特别是政治家和相关学者经常探讨的话题。仅从字面上理解,所谓“历史认识问题”,本来是无褒亦无贬的。但在当今中国,一般习惯上已将所谓“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理解为日本人对日本侵略战争历史和应负的战争责任等的错误认识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本文中笔者也是基于这一理解来写作的。

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一直是埋在中日关系之中的不安因素,是战后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的一个问题。它时隐时现,时缓时急,严重地干扰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则有必要先理清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特别是深入剖析形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心理原因,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 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外因

近年来，中国学界关于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虽然大多集中在对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主要表现——靖国神社问题、篡改历史教科书问题等方面^①，但在各类研究成果中，也都程度不同地分析了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产生的原因，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关于影响日本人的历史认识的外因，一般认为主要有如下两方面。

（一）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是美国因素影响所致

很多学者认为，日本人的历史认识之所以会发展成为问题，主要是因美国人的纵容所致。如有的学者指出：“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在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上同亚洲各国背道而驰并且越来越远，是与美国在占领日本时期对日本不认罪态度的纵容、旧金山和会至冷战期间对日本的庇护和扶植、冷战结束以来怂恿和帮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政策分不开的。美国出于地缘战略的需要，其对日政策将是长期的，中日关系中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分歧也将是长期的。”^②也有学者指出，战后美国的占领政策是使日本政府坚持右倾史观的根源。在日本战败前夕和日本战败后的短时期内，虽然美国是想通过对日本的占领，达到削减或消灭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目的，并无扶植日本的打算，但随着冷战的开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为一己之私允许日本战犯重新掌握政权，这实际上等于为日本政府开辟了一条不承认侵略战争、坚持右倾史观的道路。^③

（二）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是因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受害国家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力量太弱造成的

日本政府在上世纪 50、60 年代对菲律宾、韩国、印尼、缅甸、越南等国的战争赔偿交涉中，利用经济大国的地位软硬兼施，进行了多起

^①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吴广义《解析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年）以及张天明《1980 年以来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2009 年第 4 期）等论著中已经进行了相当全面的述评，此处不再赘述。

^② 游博《中日关系历史认识问题中的美国因素》，《和平与发展》2006 年第 4 期，第 52 页。

^③ 参见陈景彦《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与日本政府的历史观》，《现代日本经济》2005 年第 4 期，第 4 页。

把战争赔偿更改为无偿经济援助的名目上的操纵。^① 因此，可以说，迄今为止，日本政府从未对亚洲各受害国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赔偿，加之亚洲各受害国对战争赔偿的放弃，客观上使日本政府及日本人混淆了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的区别。日本政府更失去了以侵略战争为训，进行真正的深刻反省的机会。这是放弃战争赔偿在日本政府的历史观上所产生的客观影响。^② 还有学者更明确地指出，其实，这第二个外因，也是由于第一个外因造成的。美国在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对日本社会各个方面进行重大改造的同时，也就剥夺了盟国的其他成员国家对战后日本国家改造的参与权力，尤其是剥夺了近代以来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彻底追究日本侵略战争的责任的权力。这种局面所导致的直接恶果之一，就是日本在处理国际关系的实践上，凡事都只归服于当时以强者姿态出现在其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的美国，而对被其直接侵略伤害的亚洲邻国，既不肯服输，也不肯认罪。^③

二 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内因

关于影响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内因，学者们分别从经济、思想、文化、政治结构等多领域多视角进行了探讨，研究成果相对而言也更为丰富一些。

如部分学者从日本经济方面探讨影响日本人历史认识的原因时指出，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及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刺激了政治欲望的膨胀，从物质的层面上为日本右翼歪曲历史提供了保障，而日益增多的民间索赔案，又成为教科书修订的直接经济动因。^④

① 柴垣和夫『講和から高度成長へ（昭和の歴史9・小学館ライブラリー）』、小学館、1983年、123～126頁。

② 参见陈景彦《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与日本政府的历史观》，《现代日本经济》2005年第4期，第5页。

③ 参见卞修跃《〈新历史教科书〉与战后日本国家的历史认识》，《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第203页。

④ 参见姜良芹《日本“教科书”问题的经济背景》，《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3期。

从思想、文化、政治结构等视角探讨形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内因的研究，虽然论述的深浅不一，但大多集中在对天皇制、皇国史观的负面影响的探讨上，且观点大同小异。例如，有的学者指出，天皇的战争责任一直得不到清算，这就向人们提出一个严肃问题，既然日本人不承认天皇的战争责任，就更难奢望日本对外承担战争责任。正是这种对天皇无条件崇拜的皇国史观，阻碍了日本人在历史问题上有一个正确认识。^① 还有的学者指出，天皇制的保留，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被免于追究，具有十分严重的象征性意义。作为一般的日本民众，多数人也无意去深究绝对主义天皇制与象征天皇制之间的本质差别，对他们来说，天皇依旧是国家的象征，依旧是国家的最高元首。天皇制被保留下来，那么，作为这一国体制度理论支撑的神国观念和皇国史观，反过来也便在战后重新获得了合理性。这一点，战后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及右翼势力也多方利用，作为他们散布错误的历史认识的重要手段。^②

对此，连日本的外交官也有同感。日本外交官小原雅博曾在其著作中指出“日本没能找到相当于德国纳粹那样的承担历史清算责任的特殊对象。周恩来总理曾表示，中国把日本军国主义者与一般的老百姓区别开来，把战争责任归咎于前者的方式，放弃政府赔偿，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可是，在从战前至战后有一定连续性的政治状况下，日本没能像德国一样以‘加害者限定论’总结历史，只好采取了‘大家都有责任’的形式。”^③

以上诸位专家学者的分析，对我们理解影响日本人历史认识的内外因，都非常有帮助。但是，笔者有一事不解，即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虽然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日本的历史认识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严重障碍，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来，则出现日本对待侵略战争历史及战争责任的认识逐渐恶化的现象，如有学者认为“日本社会在如何

① 参见刘金才《近代天皇观与日本“历史认识”的解构——读安丸良夫〈近代天皇观的形成〉》，《日本学刊》2010 年第 1 期，第 154 页。

② 参见卞修跃《〈新历史教科书〉与战后日本国家的历史认识》，《抗日战争研究》2001 年第 4 期，第 204 页。

③ 小原雅博《日本走向何方》，加藤嘉一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年，第 138 页。

认识侵略战争历史和如何承认战争责任，以及如何取得曾经遭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的邻国，尤其是受害最重的中国及其人民的原宥，并重新建立信任关系等具有根本原则性的问题上，出现了整体右倾化的趋势。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责任的认识与处理政策进行了调整、转换和再调整，总的趋势是在回避和掩盖战争责任；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相应地开展了对保守派政治家的支持活动，甚至要求将历史认识倒退到侵略战争中流行的观念；而日本大多数民众对这一逆流采取了容忍、默认和认同的态度。”^①有的学者还指出：“自明治时代起深入渗透到日本社会各个层面的神国观念、皇国史观、绝对主义天皇制观念、恃强凌弱和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侵略观念，其不仅在战前和战时上升为日本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而支配着整个日本社会，而且在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也一直得到日本国家统治阶层的深深认同。也就是说，皇国史观和军国主义理论是自明治时代而迄于今日日本政府及其官僚们一贯坚持不放的基本理念。”^②如此说来，在这种内外因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日本人的历史认识为何却会以 20 世纪 80 年代为界，前后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呢？

对此，有日本学者建议，考虑这个问题，要注意日本的政治结构，注意日本的选举政治。但我国学者则明确指出，日本学者的“这个提醒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能完全说服人。日本的政治结构和选举政治 30 年来并没有改变。为什么第一个十年没有历史认识问题呢？为什么第二个十年出现了历史认识问题，日本政治领导人能够约束自己呢？政治领导人引导民意的责任是不能忽视的。中国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在努力引导民意从中日关系的大局着眼，不要作出过度的反应，而日本领导人在推动、怂恿民意朝着不利于中日关系大局行动。例如，1985 年中曾根首相参拜过靖国神社后，反华的右翼活动明显增强。反华右翼活动的增强又推动着政治家的历史认识向倒退方向发展”^③。笔者认为，个别日本领导人在日本人历史认识问题方面的负面作用固然不容小视，但对日本

① 吴广义 《解析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 页。

② 卞修跃 《〈新历史教科书〉与战后日本国家的历史认识》，《抗日战争研究》2001 年第 4 期，第 202 页。

③ 张海鹏 《试论当代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1 期，第 20 页。

民众的这种历史认识的变化，还有必要深入探讨其独特的心理文化根源。也就是说，作为对形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内因研究，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其心理方面的原因。

三 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心理原因

目前，国内外学界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探讨日本人历史认识问题的研究中，据笔者管见，日本学者南博的分析最为深刻。^① 中国学界仅见一篇相关论文，该文认为一些日本人之所以总要利用各种机会来推翻侵略战争的历史铁案，就其心理意识而言，他们对过去的侵略战争首先考虑到的是面子问题，而非战争性质和由于战争所犯下的罪行问题。^② 对于如此沉重的历史认识问题，仅以一个面子问题来予以概括，显然缺乏说服力。笔者以为，还应该考虑到日本人的如下三种心理特征对其历史认识造成的影响。

（一）以退为进的“罪己”心理

“罪己”是笔者对日语“けじめ”（kejime）的意译。从日本人使用“罪己”一词的语境来看，它往往要求做出“罪己”的行为主体，必须根据某种约定俗成的道义而自行做出不同程度的自责自罚。有的日本社会学家甚至称，拥有“罪己”意识，“是日本人的才智聪明之处，是作为成年人的条件”^③。

日本人的罪己方式，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多有不同。如果罪己的主体是个人时，主要有如下四种方式：（1）对自己处以社会声誉上的责罚，如在新闻媒体上进行公开道歉等，这也是最为普通的一种罪己方式。（2）对自己处以经济上的责罚，如自行削减工资和奖金待遇等。（3）从社会地位层面对自己进行责罚，如主动辞去公职等。（4）对自己处以身体上的责罚。采取这种罪己方式时，轻者，如把一头秀发剃

① 参见南博：《日本人的自我》，刘延州译，上海：文汇出版社，1989年。

② 参见李守福：《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社会心理探源》，《比较教育研究》2001年第7期，第49页。

③ 穴田義孝編著『日本人的社会心理 けじめ・分別の論理』、人間の科学社、1998年、7頁。

光，或者是到寺院参拜百次，或者是徒步到 88 个宗教圣地参拜等；重者，则会以命谢罪，如自杀，这也是最为严厉的罪己方式。行为主体采取哪种“罪己”方式，主要视外部情境压力大小而定。^①

其实，对日本人“罪己”的事例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所谓的“罪己”，实际上是一种以退为进、最大限度维护自己利益的行为心理。虽然表面看来是一种基于伦理道德标准而主动进行的自罚，但实际上完全是迫于外部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罪己者对自己的行为将会受到何种责罚是有估算的，先自行罪己，其目的往往不是出于真诚的忏悔之心，而是防御先行，自己先承认错误，请求宽恕，这样做即使不能回避他罚，也有助于减轻他罚的程度。自罚罪己最终目的是取代、回避他罚。

这种“罪己”心理在日本人历史认识上的典型表现，就是“一亿人总忏悔”。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后，成立了以皇族东久迩稔彦为首相的内阁。1945 年 8 月 25 日，东久迩在会见记者时，提出了这一口号。这是一句模糊战争责任的口号。虽然东久迩内阁任期并不长，但统治集团这种思想对社会影响很大。日本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南博对此曾有过很精彩的评述：“日本人的自嘲虽然表面上显示反省、自罚的心理在起作用，但实际是想通过自罚，减轻或逃避他人的惩罚，潜藏着自私心理。这种自嘲又和这样意义上的自责、忏悔联结在一起。即在他人追究责任之前，先责己。”“这种抢先自责，比如在战败之后所谓的‘一亿人总忏悔’中，有明显的表现。忏悔是先于他人追究责任之前，陈述自己的责任，坦白并忏悔自己的罪过。自责是通过坦白、忏悔，承认自己的责任，以图免去他罚。它的重点不在于查明责任，给予与罪过相应的处理。这种抢先自责和自嘲同样是为减轻、逃避他人的追究，作为自我防卫手段而使用的。战争失败后，在战争责任尚未受到严厉追究的情况下，以所谓‘一亿人总忏悔’回避自己的责任，为此扭曲了至今日本人的价值体系，以今天在连一个违反政治道德的政治家的责任，也不能彻底追究，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②

^① 具体事例，参见张建立：《从社会事件看“罪己”意识》，载《日本：2007》，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年，第 277～285 页。

^② 南博：《日本人的自我》，刘延州译，上海：文汇出版社，1989 年，第 42～43 页。

(二) 既往不咎的“祓禊”心理

如果说,“罪己”是一种依赖自力的自罚,“祓禊”则是一种依赖他力的超度和再生了。这两个词,已经成了日本政治家们的口头禅。

“祓禊”本是中国之古俗,祓禊之俗最迟在西周时就已形成。祓禊之俗一面体现了上古神秘的宗教遗风,一面也展现了后世消灾祈福的民族心理渊源。祓,拔除、拂除病气之意;禊,修洁、净身之意。祓禊,即通过洗濯以除去凶疾的祭祀仪式。古人认为,一切灾难、疾病、不祥,都可以用清水洗掉。在祓禊风俗中,不仅有驱邪祛疾之意,还有择偶、求子的内容。对于未婚女子来说,祓禊的目的是择偶,而对于已婚女子,则是为了求子。

在日本,“禊祓”本是神道中很重要的术语。据《广辞苑》的解释,“祓”有三种含义:(1)指为了拔除灾厄、污秽、罪障等而进行的神事。或者进行这种神事时对神宣读的祈祷词。或者是除厄牌。(2)为了赎罪而献出的物品。(3)币帛。“禊”有两种含义:(1)身上有罪或污秽时,或者参加重大的神事之前,在河、海洗浴净身。(2)禊祓的略称。“禊祓”又与“大祓”同义,古时候,6月与12月的晦日,亲王以下在京的百官会集在朱雀门前的广场,举行拔除万民罪孽和污秽的神事。现在日本全国各神社依然在进行这种神事。

由此来看,日语中的祓、禊与中文里的禊、祓的基本含义虽然相同,都有修洁净身、消灾祈福之意,但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特别是在日语中“祓禊”不是连在一起使用的,即便是连在一起使用时,顺序还是颠倒的,是“禊祓”而非“祓禊”,举行这种活动的时间也与中国古时的祓禊风俗不同,而且,日语“禊祓”里,没有中国祓禊风俗中的择偶、求子之内容。不过,或者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即日语“禊祓”将中国祓禊风俗中的择偶、求子之内容予以抽象化了。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日本文化中,“祓禊”观念,不仅已经成为日本神道祭礼的重要内容,而且也已成为日本人净身洁心的重要仪式。由于受“祓禊”观念的影响,日本人不仅注重生活环境的清洁,也格外注重追求人格的清白。当自身有了错误的言行时,往往就会觉得自己的身心都被玷污了,需要通过某种仪式或类似仪式性的行为来除却污秽以获得新生。这种通过除罪拔厄重获新生的观念,与单纯的求子、祈求新的生命的观念

虽然不尽一致，但在祈求新生这一层面还是有一定的共同之处的。从这层意义上讲，将日语“祓禊”理解成为是对中国祓禊风俗中的择偶、求子内容的抽象化，也不无道理。

“祓禊”观念与自省“罪己”观念，很早就已经成为日本人谋求身心新生的两个重要的精神理念。“罪己”是一厢情愿的行为，它并不能保证罪己者的自罚行为能够获得谅解；与这种自省了断的方式相对，“祓禊”则是一种来自于外部的责罚和磨砺。唯有在经历一个“祓禊”的仪式后，即真正求得社会的谅解之后才可能有一个较为客观的罪己。例如，一个政治家，因某事引咎辞职做出了相应的“罪己”后，待经过一段时间再次当选复出时，便会称“祓禊结束了”，意即已经接受社会责罚并获得许可再度复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尚有前嫌未释，也不会再有人来翻其旧账。如某些因政治丑闻辞职的议员，辞职前常会因此遭国会议员、媒体等诘难，但当其通过辞职再次当选后，就没有而且也不会再遇到类似的诘难。

如果结合日本人的“祓禊”心理与自省“罪己”心理，来看以 20 世纪 80 年代为界日本民众的历史认识发生的重大变化，似乎也就没有什么难以理解之处了。众所周知，在战后初期，多数日本人都能承认在侵略战争中日本军曾有过残酷行为，其负疚感还是很强的，但是随着战争责任在“一亿人总忏悔”的口号下被模糊化而不了了之，随着甲级战犯的释放和一些战时领导人再度出任政府要职，一些侥幸逃过绞刑的战犯如重光葵、贺屋兴宣等成为日本战后的政界和商界要人，战后日本的第一至三届内阁首相，不是出身皇族就是出身旧官僚。1957 年组阁的岸信介本人就是甲级战犯，其内阁中从大臣到长官，曾接受过“清洗”的人达半数。^① 再加上亚洲各受害国对战争赔偿的放弃或追讨无力，及至今日，当年战犯的儿孙们都已经在日本首相的位置上潇洒地走一回，所以按照日本人的祓禊心理，包括中曾根等日本前首相在内，很多日本人自然会认为“一亿人总忏悔”的反省罪己已经得到了世间的原谅，过了“祓禊”关，历史的包袱也可以卸下了。但是，当其得

^① 参见游博《中日关系历史认识问题中的美国因素》，《和平与发展》2006 年第 4 期，第 52 页。

知一厢情愿的“罪己”，并没有得到亚洲受害国人民的谅解时，便恼羞成怒，依仗其经济强势和依仗美国的庇护，在历史认识上口无遮拦，肆无忌惮。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因经济成功而导致日本不断增强的自信和民族主义，因此，日本对于中国坚持提出过去的问题感到非常失望和恼怒，这一切使得日本很难向以前的受害者表示一种可以接受的道歉。^①

总之，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来，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不断升级，上述日本人这种以退为进的“罪己”心理与既往不咎的“袪襖”心理的影响，显然是值得重视的。此外，还有一个让很多日本人迟迟不愿就其当年的侵略罪行做出坦诚认罪的心理，就是下述的“唯强是从”的实用主义心理。

（三）唯强是从的实用心理

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日本人倾向于将“实力”作为区分敌友和亲疏的标准。“在明治维新以前，中国对日本人来说，是一个值得尊敬、憧憬，甚至有时觉得可怕的对象。可到明治维新以后，中国对日本的这种优越地位，被西洋代替了。日本开始尊敬、憧憬和害怕起西洋来。”^②二战后，日本人崇尚实力的心理有增无减。对于其侵略战争的惨败，很多日本人亦认为日本是败在了军事力量强大的美国的手里，“负于美国让人痛惜，但在那样的物质力量和科学力量面前，是无可奈何的，这成了共同的感觉”^③。因此，虽然同样是战胜国，日本人对美国的崇拜与对中国和其他亚洲邻国的歧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坚信，打败日本的是先进、强大的美国，而不是贫穷、落后的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日本人始终不愿意向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就战争罪行进行反省和道歉，究其原因，也正是在于这种欺软怕硬的心理作祟。”^④与其称之为欺软怕硬，莫如说这是一种“混淆是非，相对善恶，唯强是从”的心理，它使日本人对在亚洲的侵略罪行即使曾心存负罪感也绝不会持久。

① 参见杜浩 《冷战后中日安全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第 20 页。

② 竹内实 《日中关系研究》，程麻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年，第 352 页。

③ 津田道夫 《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程兆奇、刘燕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年，第 120 页。

④ 李文 《日本国民心理嬗变的原理与趋向》，《日本学刊》2010 年第 3 期，第 96 页。

这种心理，与日本传统游戏——将棋的棋子再生规则是一脉相承的。

日本将棋与中国象棋，在终局定胜、负、和方面相似性很大，但在走棋过程中的棋子使用上却有着极大的区别。^①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将棋奉行“持驹规则”。

所谓“持驹规则”，即一个棋子被吃掉后，仍然可以再次作为吃掉该子一方的兵力，由吃子者随时投入几乎是任意一个有利于自己的位置。但象棋则不然，被吃掉的子是不能复生的，而且通俗点儿讲，红棋棋子生是红方的人，死亦是红方的鬼，绝不可能作为黑方的兵力重新加入战斗掉过头来攻击红方；反之，黑棋子亦然。

将棋所奉行的“持驹规则”，反映了日本人的一个重要的行为心理特征，即将善恶标准相对化且唯强者是从。就如同一个被吃掉的棋子可以轻易地被再度摆放到棋盘上攻击其原属团队一样，具体到现实生活中的日本人来说，正如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指出的那样，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行为时绝不会感到苦痛，二战期间日本俘虏的巨变以及战后的日本公众对美国态度的180度大转变，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②另外，即使是在今天，与日本人交往较多的人，只要稍加留心就会注意到，在现实生活中，日本人时时刻刻都在对自己进行着社会空间的定位，随着自己所属的社会空间的变化，其行为方式也在相应地发生着变化。

在日本人心目中，所谓适用于所有社会空间的普遍的善恶标准是不存在的，任何善与恶都是相对的，所以日本人才需要时时勤“罪己”，所以日本社会学家才会断言，拥有“罪己”意识，“是日本人的才智聪明之处，是作为成年人的条件”。^③所以，日本人才需要处处勤“祓禊”，只要经过祓禊这一仪礼，唯强者是从的言行，也就不会令日本人产生什么道德上的愧疚感。对日本人而言，将棋规则与战争规则几乎是一致的，

^① 参见张建立《从游戏规则看日中两国国民性差异——以日本将棋与中国象棋为例》，《日本学刊》2009年第1期，第115页。

^② ルース・ベネディクト著『菊と刀 日本文化の型』、長谷川松治訳、社会思想社、1992年、50～51頁、199頁。

^③ 穴田義孝編著『日本人の社会心理 けじめ・分別の論理』、人間の科学社、1998年、7頁。

日本人之所以能够与美国一起“拥抱战败”^①，且至今仍不能由衷地对侵略亚洲的历史问题做出反省，与这种国民心理的影响应该不无关系。

四 结 语

人类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依其发生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而呈现出特异性和多样性。因此，日本人的“罪己”和“袷褻”这种心理和行为，作为日本人内群行为的潜规则，虽然在日本人之间是有效的，但是，当日本人欲将这套潜规则适用于处理国际关系这一大的群际关系时，却因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而产生了很多问题。一个国家，可以理解成为一个大规模的人的群体，所谓国内行为即内群行为，国际行为亦即群际行为，由国内行为到国际行为之间的过渡，亦即由内群行为向群际行为的转化^②，这显然不是一个仅凭一相情愿就能解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人在历史认识上出现问题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我们在此指出日本人历史认识问题形成原因中独特的心理要素，目的是希望我们在思考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时，不再是仅仅停留在义正词严的口诛笔伐，我们要在思考和敦促日本政府、日本人应该如何做的同时，还应花更多的时间思考我们自己应该做什么，如何去做？

鉴于上述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形成的内因和外因，特别是其根深蒂固的心理原因，很显然，解决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寄希望于日本政治家等良心发现发挥表率作用不现实；^③一味地给日本政府、日本人定标准而不去思考如何使其达到这些标准也略嫌空洞；^④在美国为了一己之私依旧在偏袒日本的现实国际环境中，意欲“用国际清算机制取代现行的双边解决机制”来谋求解决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的提案怕也是

① 约翰·W. 道尔《拥抱战败》，胡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② 相关研究，详见约翰·特纳《自我归类论》，杨宜音、王兵、林含章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③ 张海鹏《试论当代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兼评〈中日接近和“外交革命”〉发表引起的“外交新思考”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1期，第1页。

④ 吴广义《解析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5页。

前途多难;^①主张“我国学术界同人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研究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从学术的角度促成该问题的最终解决”^②的想法可能也还是太过理想主义化了。因为,正如有些学者明确指出的那样,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直接存在于日本自身,“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日本,并不是中国主观愿望能够解决的”^③。

未来新的东亚国际秩序无论终将由谁来发挥实质性的主导作用,大概类似朝贡体系下的那种国际关系,不可能再次出现,东亚各国也将可能在极大程度上实现自立自主、和谐相处。自朝贡体系崩溃以来,虽然日本一直想主导东亚,但从历史上看,可以说,无论在任何时候,日本都没有能够成为东亚秩序的核心,今天,它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认为,从日本人的行为心理来看,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建设一个值得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敬畏的中国,为那些混淆是非的日本人创造一个彻底、坦诚反省罪己的外部情境;构筑遵循“自立与共生”原则的东亚共同体,^④帮助日本思考如何摆脱它不依靠美国依靠谁的困境,积极促进东亚人的社会认同情境的构建,将会是一种合情合理的选择。

(责任编辑:林 昶)

① 姜永泉 《“历史认识问题”:中日关系发展的症结》,《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122页。

② 张天明 《1980年以来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第135页。

③ 步平 《历史认识问题如何跨越国境》,《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1月13日。

④ 張建立「日本新政府の東アジア共同体構想およびその実現の可能性について」、王敏編『転換期日中関係論の最前線』に収録、三和書籍、2011年、169~183頁。

クティブな関係にある。日本の伝統的なコーポレート・ガバナンスは、模倣型、プログレッシブ的な技術革新モデルの導入をサポートした。20 世紀 90 年代以降、この革新モデルの支配的な地位は動揺し始め、コーポレート・ガバナンス体制の変更は求められた。コーポレート・ファイナンス市場化、ガバナンス構造の多元化と雇用形式の多様化などの改革にともなう、組織優位性と市場優位性を融合した新たなコーポレート・ガバナンスは、イノベーションの主体のイノベーション能力とパワーを向上させた。日本企業の技術革新モデルもプログレッシブ的な技術革新優勢を保ちながら、独立性、創造的な方向性への進化を実現した。

コンテンツ産業振興から見た日本の国家 ソフトパワー資源の建設

平 力群

本稿では、ソフトパワー資源の発見→ソフトパワー資源の建設→ソフトパワー資源の運用という分析のプロセスに従い、日本のコンテンツ産業振興による国家総合国力アップの実例を分析し、我が国のソフトパワーに対する理解を、ナイが提唱した「soft power」概念の束縛から解放し、ソフトパワー政策の外延の拡大を試みた。我が国の学者と政策の制定者に対して、次のように呼びかけた。我が国の国情に基づき、発展途上国および大国の復興段階の立場に立って、我が国のソフトパワー政策に対し再考を行い、我が国のソフトパワー資源に対する発見・建設と運用を強化し、「ソフトパワー」と「ハードパワー」とのバランスの取れた発展を目指そう。

日本人の歴史認識問題形成の原因について

張 建立

20 世紀 80 年代以来、日本社会では、その侵略戦争の歴史への認識や戦争責任の承諾などといった根本的な原則問題において、右翼化の兆候が現れてきた。こういった日本人の歴史認識問題の形成には、アメリカの放任、皇国史観の影響とは当然密接な関係を有しているが、一方、譲歩によってより多くの利益を得ようとする「けじめ心理」、過去の誤りをとがめだてしない「みそぎ心理」、実用主義の強者追従心理からの影響も看過できないであろう。